

恩格斯晚年思想转向原因的再探

吴启文

(江南大学,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恩格斯晚年思想的重大变化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推动下民主共和国的民主制度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普选制的发展,使人们看到了终有一天工人阶级有可能获得多数票面上台执政。在思想界各种学说只有经过冲撞才能融合,这也促进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修正和完善。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与发展中的现实生活始终保持一致的学说。列宁没有重视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作出重大补充和修正,反而给予了曲解,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历史已证明了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转向是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而列宁与之相反的思想却已被实践所否定。

[关键词] 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能力;普选权;民主共和国;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3)01-0000-00

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三个阶段》(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一文中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阶段,我在该文中指出了恩格斯晚年思想中的四大转向:1、从不断革命论到不断发展论;2、从剥夺剥夺者把有产者变为无产者到把无产者提升为有产者;3、从暴力革命到和平过渡;4、从打碎旧国家机器到承认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我用从……到……这样的句式来表达其思想转向是想表明这决不是用后者来否定前者,而只是表明思想演化的一种顺序和进展,是后者对前者的一种补充,修正和完善。恩格斯思想变化幅度之大使得一些深受列宁——斯大林主义传统思想影响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因而在国内外理论界常常出现许多误解和曲解。本文打算进一步探讨恩格斯晚年思想转向的原因,只有对其前因后果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才能减少和避免那些误解和曲解。本文将从实践和理论这两方面来加以探讨。

一、政治实践的直接推动

恩格斯在1889年12月18日给丹麦社会党的左派分子格·利特尔的信中仍在强调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

治统治。”^{[1]469}但是仅仅过了九个月,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一文中以及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就对暴力革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前一信中,恩格斯指出:“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给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带来荣誉,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2]396}在后一信中说:“党将构筑街垒,诉诸武力吗,党一走不会给自己的敌人帮这个忙的。……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20%对80%,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因为暴力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25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2]401}在这短短的九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会促使恩格斯坚持了40余年的思想发生如此重大的飞跃式的进展呢?

1. 在社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德国工人阶级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惊人的重大胜利!1890年1月,德国议会否决了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该恶法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废除;2月,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50万张选票。3月,俾斯麦被迫辞职。议会斗争的胜利,使人们大大提高了对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的认

[收稿日期] 2012-10-20

[作者简介] 吴启文(1932—),男,江苏常州人,教授。

识和信心,但正是在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由少数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所谓“青年派”却坚持暴力革命,反对议会斗争,指责党的领导人是“机会主义”。他们企图把恩格斯拉到自己一边来以壮声势,《萨克森工人报》在其报导中就表露这种企图,恩格斯在其回应该报的文章中引出了他们的想法:“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希望,正如当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人工的健康思想所克服。”恩格斯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他答复说:“编辑部喜欢‘希望’什么并且有兴趣‘希望’多久,都可以听便,只是我不打算和它‘共同’去希望。”他说自己原来对他们不大了解,“当看到有人竟极端无耻地企图宣布我支持这些先生们的阴谋时,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2]395}他深刻地揭露被青年派“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与“青年派”展开的斗争。“青年派”的挑战促成了他必须尽快表态。

2. 但我们不能误以为恩格斯的思想转向是在1890年的九个月中完成的,从已知的资料来看,他密切注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关系的变化已有多多年,早已酝酿着思想上的重大变化。这从他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在该文中他对1848年和1871年两次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探讨了两次失败的原因,详述了为什么不能再把暴力革命当作“先锋队”,为什么必须把非暴力的和平过渡当作“先锋队”,而把暴力革命改作“后备队”;为什么应该放弃不断革命论,推行不断发展论,这是从十九世纪后半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得出的结论,当时火车、轮船、汽车等全新的交通工具,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使世界市场大为扩张,电这一新能源的利用,更使资本主义如虎添翼,蓬勃发展。这表明“当时的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天,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张能力。”^{[2]540}据唯物史观“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3]488}恩格斯正是依据马克思上述的唯物史观和他对资本主

义经济现状的认识,对他们当年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修正。他指出,当时认为“完全存在着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的前景,”^{[2]540}这里说的少数人的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多数人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希望从前一革命不停顿地转入后一革命,即所谓的不断革命论。恩格斯对此反思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7]这是运用唯物史观解决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一次性重要的示范,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所作的上述判断:“远没有成熟”,“还具有很大的扩张能力”当然决不局限于从1850年到1895年,而是定会延伸到此后很长的时间,将构成整整一个时代。因此必须修改工人政党的战略和策略。

同时他进一步分析了军事技术的发展,使得那种依靠少数人的突然袭击,运用结盟战术已很难取胜,盲目地发动武力进攻会使工人运动中的骨干力量白白的牺牲掉,那是不明智的“恩格斯大力肯定了普选权,他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已利用选举权推翻了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所以选举权是最锐利的武器,是以没有胜算的武装起义更好的取得执政的武器。

恩格斯在1886年给他自己的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对从那时(1844年)以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互关系的重大变化作了仔细的考察,这是他思想转向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将在第二部分加以介绍。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进一步完善

从思想发展的长过程来看,马、恩非常重视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来审视,检验自己创建的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是否需要修正和补充,这一工作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恩格斯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数十年丰富的社会阅历使他有可能更好地来完成这一工作,他并不是在1890年后才开始这一工作的,而是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便立即开始了。

1. 《共产党宣言》1888年的注释中对“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段斗争的历史”的提法作出了修正和补充!指出必须把这一原理的适用范围作出限定:那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因为“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知道。”^{[3]251}这一情况马克思生前即已知道,曾企图用“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马克思逝世后不久,即1884年,恩格斯出版了他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

源》一书，他在序言中说“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1]我们可以把恩格斯在1883年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和修正都看作是完成了马克思的未能完成的遗愿。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俩的共同的事业。

2. 1890年恩格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过去只是把国家看作是阶段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产物，简单地把它看作是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维护他们的阶段利益的压迫工具，而现在则认为：“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1]482}而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只是提到：“在阶段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僻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1]169}可见他早已初步认识到无阶级的社会中已产生了公共权力。

3. 在社会发展中经济因素的作用问题上，恩格斯1890年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他指出在社会发展中经济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477-479}

4. 补充了社会意识形态在其自身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恩格斯在给弗·梅林的信中说：“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俩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1]500}但同时也应承认“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522}

5. 修正了阶级斗争学说，承认阶级合作在阶级关系发展中的正当地位和积极作用，这是在恩格斯晚年众多论述中已呼之欲出的观点，只是尚未用文字表达出来而已。但这并不影响人们领悟其思想，伯恩斯坦是最早循恩格斯的思路阐释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理论家之一，他提出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合作也是动力。恩格斯指定他作为其遗嘱执行人之一，证明了恩格斯对他的信任。

我们在何处观察到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倾向呢？恩格斯密切追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达40余年，发现了他青年时代所未曾观察到的阶级关系的另一面，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仅有尖锐的利益冲突所引起的阶级斗争，而且有利益的一致、协调而引起的对立阶级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在1886年，1892年为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所写的几个序言中，他有机会把他所观察到的事实向广大读者作了报导。

“工厂主们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让所有工厂主望而生畏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从前被看作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作完全合法的机构，当作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而罢工的，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

在1886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附录中说：“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

以上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已认识到它与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中不仅有利益对立的一面，而且有互利的一致的一面；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所创建起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东西未必仅仅有利于它们，民主共和国、议会，普选权等对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的，应当善加利用，而不应抵制、拒绝。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种程序的阶级合作。

这样理解的证据尚有如下数点：

1.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1886 年的美国版附录中,有批判其早期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一段话,后来在 1892 年德文第二版的序言中又转录了这段话,但却作了一些修改。这小小的几处修改颇为耐人寻味。在附录中说“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但在德文第二版的序言中却改为“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是更坏。”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来看,既然实践已证明它“绝对无益”,就不能说它仍是抽象上正确的,恩格斯显然感到了自相矛盾,于是改为“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是承认在某些情况下,阶级合作是可能有益于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尚未遇到它适用的条件,一旦适用的条件在熟,它就可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所以他没有完全否定它,而是为它在真理大厦中预留了一个空间。

2. 第二处修改过的地方是把附录中“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这句话删掉了,更明白地透露了他的思想倾向性,即不应完全否定阶级妥协与阶级合作。

3. 马、恩对拉萨尔一向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指责他搞阶级合作,在阶级对立中搞调和妥协。但恩格斯在 1893 年写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即承认了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应有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他写道:“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国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激情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都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与敌对的关系。”^[4]

4. 恩格斯在评论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时写道:“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交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交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5]291} 这个思想应当也完全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即适用于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上,因为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验证自然、社会、人类思维存在着共同遵循的普遍法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得到如下重要结论。

恩格斯先是用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学说来否定了以阶级合作为基础的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后来又用阶级合作的必要性来否定了过分

强调阶级斗争的片面性时,人的认识就达到了一个综合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的一个更全面的更高一级的认识阶段。人们对复杂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历肯定、否定、再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这样一种曲折的有三个阶段的认识周期,这是人们认识过程中常见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最早发现并以正题、反题、合题(简称正、反、合)来加以表述,而恩格斯则以否定之否定规律来加以肯定。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对这种周期现象有过明确的表述:“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殊、特性等等”,“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之否定)”“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不是延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在否定之否定阶段上第一次被否定了的某些因素,特性又会再次得到肯定,当然这是经过批判和修正过的肯定。人们的认识就在这种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得到提高,列宁曾在哲学史上举出了好几个这样的“圆圈”:近代有霍尔巴赫——黑格尔——费尔巴哈,又有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如今在我国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中出现的“两头真”现象,这是一个新例,其中的第一人便是陈独秀,他们仿佛是重走了一遍恩格斯已走过的路。

据此,我们可以判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完全合乎认识规律的一个更全面的综合性的阶段,因为它包容了第一,第二阶段中所有的积极因素;是一个极其在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阶段。

三、理论基础的完善对政治实践的影响

恩格斯在理论基础上的重要补充,修正和完善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调整,我们可以从对阶级斗争,国家性质认识上的变化来看它如何影响了对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等政治学说的补充修正。首先,我们要看到,恩格斯坚持认为他和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为什么?这是因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反映了人类的共同本质,反映了人类的共性,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各阶级之间虽有利害冲突,但他们之间仍会有某些共同利益,仍然可能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合作。但人本主义不能解释具有共同本质的人类为什么会分化成利益不同和对立的不同阶级属性,产生了阶级矛盾,所以它不可能帮助无产阶级去认识具体的社会现实生活,依靠它的指引来解决阶级矛盾。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批判它的原因,那种认为马、恩已完

全抛弃了他们早期的人本主义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其次,过去我们只把国家认作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它只能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予以摧毁,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根据恩格斯补充的分工说,我们对历史或现实中存在于国家机构中的处理公共事务的全民性职能应看作是原始社会中公共职能的一种延伸,由于人类有共同的本质和某些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需要,它不会因阶级性的出现而消失,如防止外敌入侵,防灾赈灾,水利,防盗贼,制止民间斗殴等公共事务。到了现代,其全民性职能就更多更复杂了,如环保,卫生,气象,地震,邮政,通讯,交通,消防,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等,其重要程度及其占国家行政工作中的比重已超过了阶级性的职能,恩格斯显然已敏锐地观察和认识到了现代国家性质的全民性的一面,他尤其深刻地认识到民主共和国的民主具有全民性,并无阶级性,所以他才会把民主共和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可以现成地加以利用,无需打碎它以后重建新的国家机器,把民主共和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其实质就是把它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既斗争又合作的场所,就如体育竞赛的两个团队需要共同承认一个游戏规则一样,政治上竞争的几个政党也需要承认宪法,选举法,所以在竞争中必然也包含了合作。

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中尚有积极作用,尚未完成其历史使命的现实的前提下制订了一条和平过渡的方针,而过去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却是在一个假设的非现实的前提下制订的。依据新的方针,工人政党即使在普选中取得执政权,也不应采取消灭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积极作用,同时对私有制中的弊端实行逐步改良的渐进的途径来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谋福利,推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自发产生的社会主义因素如股份制,合作制进一步完善,创造新的社会主义因素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高额遗产税等,应当把争取到的“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利益看做分期偿付的债款。”^{[2]470}在此阶段上执政的工人党唯一可行的就是毛泽东曾提出过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阶级合作的政策,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只宜缓解,不应故意去扩大的,应当把基尼系数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能否正确对待恩格斯晚年留下的那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将会决定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成败和兴衰!我们把瑞典社会民主党与苏联共产党加以对

比就可以明白这绝非危言耸听!

瑞典社会民主党竞争可说是对恩格斯补充,修改和完善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最深实践最好的政党之一,它很好地利用了民主共和国这一现成的政治形式来推行其渐进式的改革,它保留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利用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又根据其功能社会主义理论对其进行改革,限制了它的消极有害的作用。瑞典社民党在其早期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后,曾一度推行过把私营企业公有化的激进方针,后因经济效率大降,民众不满,在改选中下台,他们吸取了教训,重新执政后就不再纠缠于所有制,而是在收入的再分配上下功夫进行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功,使瑞典成为令人羡慕的发达国家,为在“资本主义尚具有巨大的扩张能力”的历史条件下工人政党如何执政提供了一个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相结合的范例。它还证明了民主共和国的纠错机制远胜于“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苏联则提供了一个只讲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推向极端,终于使自己走向失败之路的一个例证。一种学说的创始人前后思想有重大变化者,我们当然要以后期的观点为准。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否则,你怎能自称为他们的继承者,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呢。列宁对恩格斯有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观点就没有真正读懂,他曲解说,“民主共和国只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6]也就是说,民主共和国只是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已,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中仍然要打碎民主共和国这架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它,在实践中列宁正是这样干的,造成了数不清的人为的灾难。恩格斯决不是把民主共和国当作桥那样的捷径,过了河就可拆桥,而是径直把它当作“目的物”,并不需要把它打碎后重建专政,他在1894年给拉法格的信中提供了一个无法曲解的论断:“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1]508}(重点是作者所加)列宁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认识和评价上与恩格斯完全相反,他在仅距21年后,即在1916年便认为资本主义已到了“垂死阶段”,而且在11年前他自己在1905年写《两个策略》一书时还认为俄国“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主张通过民主革命“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7],当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他大概是被革命的狂热淹没了理智,也可能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实行了已被恩格斯明确否定了的不断革命论,宣布立即废除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方针。说明他对恩格斯晚年发

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一点也没学进去，他斥责批评他的第二国际代表人物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人为“叛徒”，其实是他背叛了他自己过去曾坚持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迫推行新经济政策，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生产者存在的合法性，这一政策仅执行了几年，列宁一死，斯大林就推翻了这一政策，恢复消灭资本主义的方针，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数暴力来镇压反对者，这种依靠恐怖巩固起来的制度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活力和创造力，并且在消灭了旧的阶级对立后又产生了新的阶级对立，所以仅仅生存了 70 余年就寿终正寝了。

四、论敌的批判和追随者的疑虑 促进了恩格斯的反思

任何一门学问、一种主义，一个学派往往是在不同观点的争论、辩驳，思想的冲撞中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亦然，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阶段产生的重大变化就与论敌的批判和追随者的质疑有密切的关系，举数例以明之。

巴枯宁从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出发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歪打正着，惊人地预言了数十年后在实践中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会是什么模样，马克思在当时作了摘录，并给予点评。

巴枯宁说：“任何国家，他们的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他批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是“人民意志的表现”，认为都是谎言。“少数特权者管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是的，大概是工人，但是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他们将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向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学问的……将完全被当作被管理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啊！”“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人们便想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人们原可以期待，马克思将用巴黎公社的民主经验来加以反驳，那无所不在的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监督，足以防止出现巴枯宁所指控的弊病，公社不是已经终于

找到了防止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的政治形式了吗，令人不解的是马克思却是用工人合作社来类比国家，他说：“如果巴枯宁先生哪怕是对工作合作工厂的管理者的地位有所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彻底破灭了。”^{[8]637-640} 这个反驳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一个小小的工人合作社与管理数十万甚至上亿人口的国家机构具有不可比性，后者的管理者手中握有暴力和种种强制手段，而前者是没有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并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他们用“人民国家”、“自由国家”、“自由人民国家”等概念来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在受到马、恩的严厉批判后仍阳奉阴违，倍倍尔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说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哥达纲领草案》的判断，并说他已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但在 11 年后倍倍尔写的《我们的目的》一书中，仍然写着“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列宁作了上述揭露后斥之为：“为机会主义观点”。

马克思为了降低和淡化人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和暴力可能无限制扩大的疑虑，曾这样说：“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8]416} 这就是说专政的权力和暴力将会受到“合理”、“人道”的约束和限制，但这仅是主观上的东西，类似于中国人的“良心”，其约束力是很有限的，只有民主与法制才能最有效地约束专制和暴力。马克思的这两次辩护虽未令人信服，但却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决不愿意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实践中转化为极权主义和大多血腥的暴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在生前终于未能处理好民主与专政的矛盾。

在 1891 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他终于有机会重新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澄清了在专政问题上的种种糊涂观念。他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核心就是民主，公社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它与旧政权相区别的最根本的原则，特征就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创造了全新的民主的政治形式，而非无限期的权力的暴力，他对那些对无产阶级专政有误解，因而担心权力和暴力会失控而疑心的人说：“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民主共和国在其制度建设中

巴黎公社的诸民主原则如普选权、罢免权、监督权、地方自治权等逐步得到实现,所以恩格斯可以用民主共和国的取代方案,把引起无数误解和非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淡化、搁置起来,有效地解决了民主与专政的矛盾,恩格斯进一步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是更全面更务实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它已经受住了严格的历史检验,只是懂得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修正和完善,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7.

[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1.

[7]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1.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谢光前)